

《孙子兵法》导读

熊剑平 王敏 著

此本特替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

此本特替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

此本特替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

此本特替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

此本特替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

此本特替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

此本特替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

此本特替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

此本特替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

此本特替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

《孙子兵法》 导读

熊剑平 王敏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孙子兵法》导读 / 熊剑平, 王敏著. -- 北京:
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154-0841-5

I. ①孙… II. ①熊… ②王… III. ①兵法—中国—
春秋时代②《孙子兵法》—注释③《孙子兵法》—研究
IV. ①E89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30318 号

出 版 人 曹宏举
责任编辑 袁又文
责任校对 康 莹
装帧设计 古润文化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eb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 辑 部 (010) 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
市 场 部 (010) 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
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375 印张 2 插页 187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;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 (010) 66572159 转出版部。



导言

不朽的传奇，难解的谜团

——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价值和深远影响

《孙子兵法》堪称最著名、最受关注的兵学经典，它的影响力其实已经远远超出兵学领域，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其中的许多经典论断直击要害，寓意深刻，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和成语，至今仍在广为流传。这部闪烁着智慧之芒的古代典籍，今人仍然有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必要。

一、孙子其人其书

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，最早和最具权威的应该数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至于《吴越春秋》《越绝书》乃至《东周列国志》，包括《古今姓氏考》等，其中的记载怕是都不能完全采信。根据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的记载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重要的信息：孙子名武，字长卿，春秋末期齐国人。生卒年月不详，约与孔子同时。根据司马迁的记载，孙子曾携十三篇兵法拜见吴王阖闾，又以宫女“小试勒兵”，方求得拜将的机会。有人说这是伍子胥推荐的结果，大概可以相信。也有说伍子胥曾经七次推荐，可能就不足为信了。《史记》中说，吴王看到了孙武的十三篇兵法，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才答应接见孙武。既然如此，怕是无需经过七次举

荐吧？

所谓“小试勒兵”，更多的人称之为“吴宫教战”，就是将吴王宫中一群自由散漫、弱不禁风的宫女训练成可以驰骋沙场的战士。在训练宫女的过程中，孙武曾再三强调纪律，可是散漫的她们仍不断地嬉笑打闹，没有把训练真正当回事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孙武只得斩杀担任队长的两位美姬以严明纪律。吴王一直端坐在高台之上观看孙武的训练，当他看到自己的两位美姬有生命危险，便赶紧进行劝阻，告诉孙武：“寡人如果没有这两位美姬，那就会吃不好睡不香，生活没了滋味。”面对这种请求，孙武以“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”^①为由坚决予以拒绝。就这样，吴王十分宠爱的两位美姬便成了刀下之鬼。这之后，训练就变得异常顺利。一群娇弱的宫女，就此被训练成一支“虽赴水火犹可也”^②的能征善战的队伍。孙武告诉吴王，队伍我已经训练好了，尽可以让她们去打仗。吴王这个时候还沉浸在爱姬被杀的悲痛之中，带着几分恼怒对孙武说：“我知道你会打仗，但是请你先下去休息吧。”然后他便拂袖而去。看到这个架势，孙武不禁哈哈大笑：“看来大王的求贤若渴只不过是嘴巴说说罢了！”

过了一阵子，吴王大概缓过神来了，认为还是需要以大局为重，于是答应召见孙武。吴王知道孙武不仅会打仗，而且善治军，最终任命孙武为将，与伍子胥一起率兵伐楚。在攻打楚国的战争中，孙武和伍子胥联袂指挥吴军以弱胜强，连战连捷，直捣楚国的都城郢，迫使

① 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

② 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



楚昭王落荒而逃。吴国这次伐楚获得大胜，一举改变了南方诸侯的争霸格局，吴王渐而成为“北威齐晋、显名诸侯”^①的霸主。吴国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系列辉煌霸业，吴王阖闾之所以能成为霸主，孙武功不可没。

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一般被认为是孙武的著述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中明确地借吴王之口说出了这个事实：孙武拜见吴王之前曾经将这十三篇兵法作为敲门砖。这个说法，从汉至唐一直少有人质疑，但是到了疑古之风盛行的宋代，便不断地有人提出异议。《史记》中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，在宋代受到了欧阳修、叶适等人持续的质疑。他们持论的主要依据有：第一，《左传》中并不能见到孙子事迹；第二，《孙子吴起列传》中所记载的“吴宫教战”之事，更像是在说故事，“奇险”而不足为信；第三，《孙子兵法》中透露出不少战国时代特征。根据这些情况，叶适将《孙子兵法》认定为“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”。^②

其后，有不少学者跟进响应，纷纷怀疑司马迁的相关记载，将《孙子兵法》的写作年代断为战国时期。由宋代开始的这种怀疑之论，从明到清，一直得以延续，甚至持续到今天。有学者甚至考证出孙武和孙臆其实是同一个人，也有学者干脆将《孙子兵法》判定为伪书。^③

值得一提的是，“怀疑说”虽甚嚣尘上，但有不少人只是盲从，跟着凑个热闹，甚至并未进行实际考证。比

① 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

② 叶适：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四十六。

③ 比如姚际恒、梁启超、钱穆、齐思和等，相关立论参见《古今伪书考》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《先秦诸子系年》和《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》等。

如说，日本有个学者叫武内义雄，说孙武和孙臆是同一个人，“臆”是他的绰号，^①我国著名学者钱穆的观点与其几乎一模一样。^②这种说法在当时看固然有些新意，但在银雀山出土文献面前被完全驳倒。

在我们看来，宋代学者据《左传》而疑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，多少有点疑古过勇，是一种怀疑论的古史观念作祟。试以逻辑推之，《左传》没有记载的，历史上便不存在吗？怕是未必。《左传》是传鲁《春秋》的，对那些被视为蛮夷的南方诸侯国史一定程度上疏于记载，失载二三事本属正常。退一步说，即便我们真想推翻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已有的明确记载，也必须拿出确凿有力的证据，可目前还很难找到这样的证据。不仅如此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，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的观点。在这批考古学家推断为西汉初年的竹简中，有0233号竹简写有“吴王问孙子曰……”，又有0108号竹简载“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……”。^③这表明，先秦时期被尊为“孙子”者本有两人：其一活动于春秋末期的吴国，即孙武；另一则活动于战国时期的齐国，即孙臆。他们各有兵法传世。很显然，这些竹简对《史记》中的相关记载提供了直接的证明。竹简中还两次提到了“十三篇（篇）”^④，和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两称“十三篇”也形成遥相呼应之势。尤

① 武内义雄：《孙子十三篇之作者》，载《先秦经籍考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，第377页。

② 参见钱穆：《先秦诸子系年·孙武辨》，是书1935年出版。

③ 吴九龙：《银雀山汉简释文》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4页。

④ 参见《银雀山汉墓竹简·孙子兵法》，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，第108页。



其是，传本十三篇中，除了《地形篇》之外，其余十二篇均有或多或少的文字出土，这也足可证明司马迁所记载的关于《孙子兵法》的内容是可信的。

此外，银雀山竹简还为我们提供了诸如《吴问》和《见吴王》等数篇《孙子兵法》佚文，为我们考察孙子其人其书提供了新材料。

对于《吴问》，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些零星的讨论，观点截然对立。有学者认为其可以作为真实史料，^①也有学者认为它并不可信，不能作为真实的史料来对待。^②以笔者愚见，汉简《吴问》诸篇，应该是追思孙武事迹而撰成，其中肯定有史事的影子，即使添加了修饰之辞，也不能完全抹杀其史料价值。

《吴问》所记乃是吴王和孙武的一次对话，预测了春秋末期晋国几大家族的兴衰存亡，提出田制和税制等才是决定王室兴衰的关键。我们从《吴问》出发，也可以看出，孙子的政治思想以及对军政关系的认识非常高明，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两点：第一，孙子作为军事家，并不以战争作为影响王室发展的唯一要素。相反，他反倒非常看重战争之外的其他因素，尤其是政治要素。第二，孙子具有民本思想，关心田制、关心赋税都是关注民生的具体表现。孙子“厚爱其民”的政治诉求，固然是基于王室兴衰而提出，但毕竟也是一种进步思想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孙子显然不只是寻常意义上的兵家，同样

① 吴树平撰文认为，《吴问》应该是在智氏灭亡到赵、韩、魏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写的，是后人追记所成。参见吴树平：《从临沂汉墓竹简〈吴问〉看孙武的法家思想》，载《文物》1975年4月。关桐：《银雀山汉墓竹简〈吴问〉的几点考证》，载《孙子学刊》1992年第4期。

② 李零：《关于银雀山简本〈孙子〉研究的商榷》，载《文史》第7辑。

还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，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，有着非常独到和非常深刻的理解。

简文《见吴王》和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关于孙子的记载，既有相当多的共同点，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别。

在《见吴王》中，孙子和吴王甫一见面，便开始讨论战争问题。针对吴王标榜自己“好兵”，孙子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战争的认识：“兵，利也，非好也。兵，□〔也〕，非戏也。”^① 孙子与吴王见面之后，不是顺着吴王、迁就吴王，反而对好战的阖闾进行规劝，这和传世本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中所体现的“慎战”思想是基本一致的。

可能吴王阖闾认为孙子见识卓绝，故而才进一步提出了“小试勒兵”的要求。从《见吴王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孙子曾经就“勒兵”的对象提供了诸如贱者、贵者等多个选项，当然其中也包括妇人。吴王阖闾当是对“试阵于妇人”产生了好奇之心，所以做出匪夷所思的选择。面对阖闾的这一决定，孙武以“妇人多不忍”为由，请求更换训练对象，但最终遭到吴王的拒绝。我们不知道吴王是等着看笑话，还是故意为难孙武，但孙武确实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。好在他顺利解决了这个难题，把一群娇弱的女子训练成精干的队伍，否则就无法交差。关于训练过程，《见吴王》有着较为详细的陈述，我们可以看到孙武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，体现出他对“勒兵”极为重视，记述合情合理。关于“勒兵”的最终结果，二者之间也存有差别。从《见吴王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

① □，表示原字缺失，无法辨识。全书同此。



吴王在盛怒之下，应该有很多天不想见孙武，经过了一番天人交战之后才最终任命孙子为将，这同样体现了阖闾在爱姬被杀后不胜恼怒和沮丧的自然心理反应。

很显然，较之于《见吴王》，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所记载情节，其完整性、生动性、曲折性等方面，都较为逊色。由于情节缺失，所以我们在《孙子列传》中所看到的是一个颇为突兀、不尽合理的故事。这就是叶适等人所称“奇险”。叶适正是由“奇险”出发，对《史记》所载孙子其人其书产生怀疑，进而引领了宋以降学者的怀疑之风。

在银雀山竹简文献出土之前，我们所能见到并可以作为信史的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最早记载，就是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，而早于《史记》的银雀山出土文献，在很多方面都支持了司马迁的记载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出土竹简和司马迁撰写《孙子吴起列传》所依据的材料，很可能是各有来历。《史记》中所记载的“吴宫教战”，较之《见吴王》中的奇险情节，不仅稍显平淡，而且缺少了更为重要的诸如“孙吴论兵”等环节。同时，《孙子吴起列传》中关于孙子的笔墨显得太过简略，而且也没有孙武预测晋国走向之事，所以，我们大可相信，司马迁并没有看到银雀山竹简这批材料。既然如此，银雀山竹简文献是可以和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同时流传而又能求得互证的材料。因此我们主张，在讨论孙子其人其书时，不妨还是回到《史记》，固守《孙子吴起列传》。因为有了众多银雀山出土文献来作证明，司马迁的记载变得更为可信了。

二、《孙子兵法》的主要思想内容

《孙子兵法》虽然只有六千言，却被誉为“百世谈兵

之祖”^①。其主要内容多属坐而论道，探讨战争原理和战争之法。

《孙子兵法》对战争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，详细论述了“安国全军之道”（《孙子兵法·火攻篇》，以下皆直接注出篇名），主张慎战，也就是“非危不战”（《火攻篇》），并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（《谋攻篇》）作为指挥作战的最高境界孜孜以求。《孙子兵法》在开篇就指出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显然，作者以这样的判断句开篇，无非是想唤起人们对战争问题的高度重视，突出强调战争对国家和统治集团的重要影响。与此相呼应的是，其一再强调“杂于利害”（《九变篇》）和“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”（《火攻篇》），既充分认识到战争的危害性，也借此警示统治集团应当积极备战、慎重求战，以求得所谓“安国全军之道”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主张慎战，很显然是因为作者具备一种仁义情怀。《孙子兵法》在十三篇的首尾两篇，即《计篇》《用间篇》中，数次讨论了“仁”。在《计篇》中，作者在探讨为将者的基本素质时，将“仁”列在第三位，“严”被列在最后一位。在作者眼中，在治理军队、对待部下之时，仁爱之情要比严酷为治显得更为重要、更为管用。在《用间篇》中，孙子在探讨用间之术时也在无意中透露出自己对“仁”的理解。孙子认为，要确保战争胜利，就一定要舍得花钱搞好间谍战，要舍得在间谍身上大笔花钱。如果在这时候小家子气，因为吝啬而导致战争失

^① 《少室山房笔丛·九流绪论》。



利，那就是“不仁之至”。故此，他建议在间谍战中大笔花钱，以获取准确的情报，尽量降低战争成本，确保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。

《孙子兵法》还蕴含着相当进步的民本思想。孙子强调国君要“修道而保法”（《形篇》），这其实就是对清明政治的一种诉求，与儒家的政治思想有相通之处。孙子认为，领军作战也必须将“唯民是保”^①（《地形篇》）作为战争的出发点，其中所体现的也是一种进步的民本思想。作为一名军事家，孙子并不喜欢穷兵黩武，并不主张将一切都诉诸武力。在《谋攻篇》中，孙子对攻城战争的危害性有过具体的描述：“修橧轒辒，具器械，三月而后成，距堙，又三月而后已。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，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灾也。”正是因为战争具有如此之大的破坏力，所以孙子才认为“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”，必须要努力做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这其中充分体现了孙子的人文情怀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主张慎战，却不避战，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作战理论。其主张“先胜而后求战”（《形篇》），因而强调“知彼知己”（《谋攻篇》），主张在获得充分的情报之后，认真做好“庙算”（即征战前筹划谋略），然后才能决定战或不战。当战争开始之后，要努力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（《虚实篇》），掌握战争主动权，同时尽可能通过“形人而我无形”（《虚实篇》），形成“我专而敌分”（《虚实篇》）的态势，以优势兵力夺取战争胜利。《孙子兵法》对战争的巨大破坏力有着清醒的认识，故此

^① 该句中的“民”，十一家注本作“人”，可能是避讳改字，但意思相通。

宁肯要“拙速”（《作战篇》），也不要那种耗费时日的持久战，此即“兵之情主速”（《九地篇》）。

《孙子兵法》还探讨了一系列攻守之道。比如《谋攻篇》中，作者围绕“以智谋攻”^①，提出了“十则围之”“五则攻之”等一系列战法，将“全胜”的战略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具体化。《计篇》之“能而示之不能”等“诡道十二法”，则力图达成“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”的效果，通过突然进攻掌握作战主动权，进而取得战争胜利。此外，《军争篇》之“高陵勿向”等“用兵八戒”，《九变篇》之“途有所不由，军有所不击”等“九变之术”，既总结了前人的战胜之道，同时也反对墨守成规，提倡以变通之术取得战争胜利。孙子也意识到防守的重要性。在他看来，出色的防守之术同样可以使得己方处于不败之地，也就是“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”（《形篇》）。他认为，当敌我双方处于对峙之时，必须善于防守，并且能够守得牢固，这才能迎来反击的机会，从而觅得获胜良机。

当然，我们还要看到，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中，“攻”和“守”作为一对重要兵学范畴，二者之间的地位并不十分相称。相比较防守，作者似乎更偏爱进攻。十三篇中，有以“谋攻”为主题的专篇，却没有以“谋守”为主题的专篇，也可侧面说明这个问题。在孙子看来，无论多么出色的防守，也会存在漏洞、露出破绽——莫非在孙子眼中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？

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充满了谋略和智慧，正所谓“兵者诡道”，但作者重视谋略的同时，也常重视实力。《计

^① 杨丙安校理：《十一家注孙子校理》，中华书局1999年版，第44页。



篇》中，孙子将“五事七计”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，这其实是孙子辩证审视战争、不单以谋略定胜负、高度重视“以力胜人”的明证。孙子认为，作战之前，一定要仔细分析有哪些利于己的因素，哪些不利于己的因素，一定要打有准备之仗，尤其强调要充分做好后勤工作，备足粮草。在我们看来，这种重视“庙算”的行为，其实也是重视实力的具体体现。《形篇》的“胜兵若以镒称铢，败兵若以铢称镒”，也论证了实力是制胜之源的观点，包括“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数，数生称，称生胜”，显然也是从提升实力的角度提出的。

孙子之说堪称力与谋的完美统一^①，这是我们解读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时必须要注意的。当然，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中，论述谋略的篇幅显然更多一些。作者对于论“谋”，显得更有热情。十三篇中，论述谋略思想的文字俯拾皆是。因此人们对孙子重“谋”的一面印象更为深刻。甚至有人认为，孙子不重“力”，只重“谋”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。

此外，《孙子兵法》还对军队建设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论述。《孙子兵法》重视将帅的作用，认为将帅是“民之司命”，是“国之辅”，“辅周则国必强，辅隙则国必弱”。（《谋攻篇》）《孙子兵法》主张，要行之有效地实施“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”（《行军篇》）的行政和教育手段，以期实现“治众如治寡”（《势篇》）和“齐勇若一”（《九地篇》）的目标，使得整个军队能够整齐划一，达到“携手若使一人”（《九地篇》）的效果。从字

^① 黄朴民、高润浩：《〈孙子兵法〉新读》，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9页。

里行间来看，孙子对士卒的认识相对模糊一些。一方面，他要求将帅做到“视卒如婴儿”或“视卒如爱子”（《地形篇》），另一方面则又认为，对待士卒就应该“若驱群羊，驱而往，驱而来”（《九地篇》）。有些学者认为这其中体现出了剥削阶级的愚兵思想，有些学者则认为这是服从作战需要的非常有用的带兵方法。我们不妨对此再进行一番讨论。

笔者认为，在孙子的治军思想中，确有“愚兵之术”存在，但我们应当对这种“愚兵之术”作客观分析。首先，“愚兵之术”与孙子“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”（《军争篇》）的总体思想相吻合，同时也与孙子重视“出其不意”的战法以及高度重视用间思想相一致。其次，“愚兵之术”当为一种常见甚至必要的治军之术和用兵之法。古代军队中都曾通用这种“愚术”，而孙子则很可能是第一个将“愚兵之术”光明正大地写进战法的人，我们似乎大可不必从道德家的立场去讨伐。孙子的“愚”，似乎纯粹是出于打胜仗的目的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也会对亲朋使用“愚术”——比如对垂危的病人，告诉他病情不重，而这正是人之常情。

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的核心思想是什么？这也是值得讨论的议题。笔者认为，其核心思想应该是“以诈谋利”。

“利”是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中的一个高频词，凡52见，只《军争篇》就多达11次，孙子重“利”是不言自明的。黄朴民说：“‘利’的思想，贯穿于整部《孙子兵法》。”^①“利”其实是贯穿十三篇的一根若断若连的红线，

^① 黄朴民、高润浩：《〈孙子兵法〉新读》，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68页。



可视为支撑孙子兵学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。孙子极端重利，以利为本，是否发动战争、战争要发动多大规模，都是以“是否得利”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。既然如此，十三篇的兵法未尝不可说是一部“争利之法”或“逐利之法”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中，千变万化的诡诈之术和谋略之术都是围绕争利展开，这是十三篇中最为出彩、最为重要的内容，同时也是留给后代军事家们诸多启迪的内容。在十三篇的首篇——《计篇》中，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“兵者，诡道也”这一著名论断，随即他便推出“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”等“诡道十二法”，并且在《计篇》之后继续探讨和设计“诡道之法”。尤其是从《形篇》到《九变篇》，“示形”“造势”“虚实之术”“用兵变法”等，几乎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。这些谋略之术和诡诈之术，便是孙子争利的最重要手段。

另外，我们也要看到，孙子在逐利的同时，也并不会忘记防止危害。“杂于利害”（《九变篇》）是孙子逐利之术的一项重要内容，“利”常与“害”“患”“危”等相对出现，正是由于能够辩证考虑利害得失，孙子的逐利之术才显得更加高明。

孙子公然逐利，在当时可能是惊世骇俗，独标新意，但毕竟是抓住了战争的实质性问题，所以才能连同他的诡诈之术一起，都逐渐地为历史所接受，以诡诈之术逐利逐渐成为古今军事家们的共识。西方十八世纪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曾说过：“一个政府为了下述的各种理由，才会加入战争：一、收回某种权利或是保卫某种权利。二、保护和维持国家的最大利益，如商业、工业、农业

等。”^①可以看出，利益至上，以利为本，同样也是约米尼的基本认识。说到底，“‘利’是战争的根本动因，又是影响和制约战争进程的深层根源”。^②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的核心内容，就是“以诈谋利”。

孔子认为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^③，墨子主张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老子提倡“绝巧弃利”^④，足可表明在孙子生活的时代，“言利”的文化氛围甚嚣尘上，“义利之辨”是当时受到普遍关注的论题。特定的历史环境，催生了孙子的功利思想，同时也催生了孙子以诈谋利的一系列战略战术。孙子旗帜鲜明地逐“利”，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风貌，是当时特定社会思潮在兵学思想发展层面的诉求。

孙子的“利本”思想体现了一种务实作风。兵家之学是需要付诸实践、具有较强操作意义的学问，必须讲究实际效应。从这个层面来看，孙子的功利思想既顺应潮流，也抓住了战争的本质。从兵学史的发展来看，孙子的重利，“从根本上划清了同《司马法》为代表的旧军礼的界限，正确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”。^⑤漫长的封建社会，儒家思想长期占据要津，以“利”为核心的价值观，遂长期受到排挤和打压。儒家“重义轻利”的义利观，曾深刻影响和改造了国人的性格和思维。“君子固

① [瑞士]约米尼：《战争艺术》，钮先钟译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，第2页。

② 黄朴民、高润浩：《〈孙子兵法〉新读》，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69页。

③ 《论语·里仁》。

④ 《老子·第十九章》。

⑤ 黄朴民、高润浩：《〈孙子兵法〉新读》，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69页。